

薛憶馮：寫作對我就像朝聖

離開中國前，薛憶馮就被認為是中國作家中「最迷人的異類」。大量的閱讀與少量的寫作一直是薛憶馮的生活。他認真寫短篇小說，力圖將數學的精確與濃密的詩意融為一體。不管他「居住」在哪裡，閱讀的質量與寫作的質量就是他「生活的質量」。他是一個居住在書面語言裡的人。

薛憶馮對寫作要求過高，高處不勝寒。在他看來，語言問題被當成一個道德問題，或者是要面對的最大的道德問題。在這個時代，薛憶馮的作品或許不會太流行，喜歡它的人不會太多，可一旦喜歡上就可能立刻全盤接納，與薛憶馮一同在哲思的世界卑微前行，加入為一種隱退的思想與文學之美的「守望者」之列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見到薛憶馮那天，恰是他再一次離開深圳遠行的日子。早晨，市中心的一家星巴克，客人稀少，薛憶馮在一張黃色小圓桌前坐下。短暫的等待，他打開筆記本電腦處理郵件。斯文的眼鏡，死盯着屏幕的眼睛顯得沒有精神，頭髮理得極短，衣着清爽，黑色電腦包放在一旁，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個經常出差的IT精英。這次臨時增加的訪問，是薛憶馮在這個城市最後的行程。

之前多次電話溝通，確認採訪時間僅有一個半小時。幾乎沒有寒暄，落座後開始直入主題，他似乎很習慣這種開門見山的採訪。他又是細心的，打開錄音機後，主動提出試錄一段，以確認嘈雜的背景音樂不會影響錄音效果。

「我對語言還是沒有把握，經常做練習，就像鋼琴大師也需要每天早上練習基本音階一樣。」口語的薛憶馮是家常的，沒有口音的語調溫和，語速略快；和他的文字一樣，濃度極高，邏輯縝密，敘述過程追求完美。傾聽的薛憶馮是紳士的，他注意接收每一個信息並反饋回來，像一塊海綿，不放過任何一個水滴，保持着作家的敏感。整個訪問信息量極大，結束的時間一拖再拖。11點不得不起身離開時，甚至沒有喝一口水。11點20分，在地鐵告別。他說，要回家拿行李，趕下午1點多的動車回湖南，從湖南再去北京，之後回加拿大。

這一次，與其說是離開深圳，不如視為他重返文壇。

過去16個月，內地、台灣出版界頻繁聽到他的名字，有人稱去年是中國出版界的「薛憶馮年」。薛憶馮帶來了令人驚嘆的成績單：長篇小說3部，《遺棄》、《白求恩的孩子們》（台灣版）、《一個影子的告別》（台灣版）；小說集4部，《流動的房間》（新版）、《不肯離去的海豚》、《出租車司機》（「深圳人」系列小說集）、《首戰告捷》（「戰爭」系列小說集）；隨筆集3部，《文學的祖國》、《一個年代的副本》、《與馬可·波羅同行——讀卡爾維諾〈看不見的城市〉》。

「金子般的文字」

二十多年前，借圖林（長篇小說《遺棄》主人公）之口，薛憶馮表達了對塞林格離群索居生活的羨慕：「我們都想逃離，我們又都在『守望』。我們在沒有希望的田野上『守望』着百孔千瘡的純潔和奄奄一息的童真。這『守望』是最後的牧歌，是最慘的絕唱。」

對於離群索居生活的嚮往，似乎早就在他心裡埋下了種子。薛憶馮兩次消失於文壇，自願鑽進了「自己的世界」。

1988年《作家》雜誌刊出他的處女作《睡星》。198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《遺棄》。1990年以中篇小說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》首次在台灣「登陸」。1991年，他和王小波同時獲得第13屆台灣聯合報小說獎。在一個頗具優勢的年紀，薛憶馮儼然已經站在了遠大前程的出發點上。但是，1992年秋天，他突然消失了。

他去了廣州。5年後，他在廣州外國語學院獲得文學博士學位。之後，他回到深圳，到深圳大學教書。2002年，他移居蒙特利爾，再一次做了一個好學生，又一次過上了嚮往的離群索居的生活。這一待就是10年，前3年回國過一次，之後5年再沒回來。離開中國的日子，他一度在內地報紙《南方都市報》寫專欄，期間也有發表小說，但是並沒有集中出版過。差不多8年時間，僅2005年回內地一次，也是為了出版小說集《流動的房間》。

2009年底，薛憶馮選擇香港作為他回歸文壇的首站。他受聘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、翻譯與語言學系2009-2010年度訪問學者。批評界對他給予高度關注，《上海文化》雜誌在2010年第一期刊出了關於其戰爭小說的長篇評論，同時，旅美學界劉復教授的《閱讀薛憶馮小說的狂喜》一文，稱薛憶馮的小說用「金子般的文字」寫成。

文字裡的薛憶馮，呈現的是既有形而上意味又有數學般準確詩化語言，幾乎沒有任何修正的空隙。既便如此，他常常截稿前還問編輯，「可不可以把一個短號改成句號？」他說，自己的一生將成為「對語言苛求的祭品」。

一個偉大的寫作者通常都有一顆脆弱和卑微的心靈。只有站在脆弱和卑微的位置，寫作者才能看清人性的弱點和生命的荒誕。薛憶馮說，因為寫作自始至終都處在阻力的困擾和圍剿之中，因為寫作從來都是與千難萬險的搏鬥，所以，寫作者的心靈又必須堅強，寫作者又必須充滿着對語言和寫作的驕傲。沒有這種非凡的堅強和驕傲，寫作者不可能突出阻力的重圍，抵達完美的境界。

薛憶馮說，「我是一個文學的『香客』，寫作對我就像是朝聖。」在通往麥加的路上，薛憶馮用「金子般的文字」，書寫着屬於他的精神自傳。

重寫的革命 迷人的重訪

重寫完「戰爭」系列小說之後，薛憶馮將其中的《首戰告捷》等三篇與「革命」密切相關的作品傳給了小說家瓦當，他有意在一本將由他主編的新雜誌上刊用。兩天之後，薛憶馮在郵件裡好奇地詢問，這一組作品將會被冠以怎樣的標題。小說家的回覆充滿了智慧和自信。他說，選定的標題是「重寫的革命」。

還有比這更切題的標題嗎？「革命」是決定中國歷史的關鍵字，也是薛憶馮這一組作品的共同主題。這個共同主題將他的寫作一次次帶進了「個人與歷史的關係」，一次次觸到了生存的荒誕和生命的硬傷。這些作品因此成為了一種對「革命」的重寫；而「重寫」本身也是一場革命：革命寫作之命以及革命寫作本人之命。星巴克的黃色小圓桌上，薛憶馮拿出紙筆，現場講述起《首戰告捷》中修改的心路歷程。

《首戰告捷》是一篇關於父子關係的作品。小說題目中的「首戰」特指將軍擺脫父親的阻撓，投身到革命隊伍之中的反叛。小說原來是這樣開始的：「現在我終於在回家的路上了。」將軍興奮地說着，指示吉普車轉入一條狹窄的土路。

「土路豈不是暗示着吉普車現在所行駛的不是土路？！這暗示顯然與故事發生的時代（解放初期）相矛盾。」薛憶馮首先決定刪掉「土」字。但是，刪掉一個「土」字雖然淡化了原來的矛盾，卻帶來了更多的問題。

「我很快發現重寫出現了方法上的錯誤，應該『辨證論治』，而不是『腳痛醫腳』。」他大膽設想，重寫的革命也應該運用中醫的武器！這時候，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「土路」前面的形容詞上。他意識到它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。通過對這個形容詞的重寫，吉普車轉向前後路況的矛盾最終獲得了妥善的解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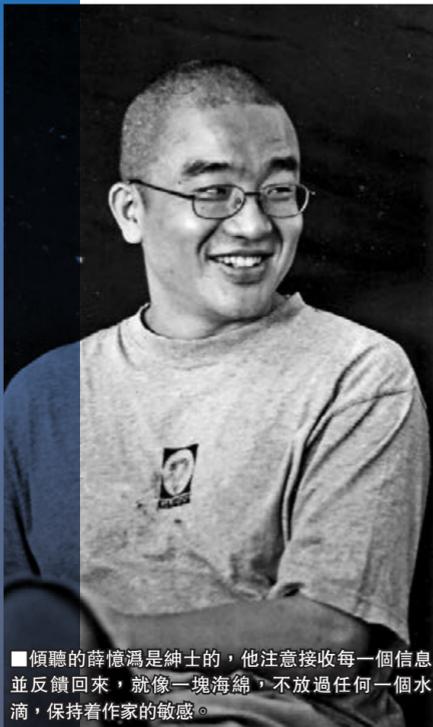
對自己作品的重新修改，是對曾經的創作之路的重訪。每一次重訪，無不源於薛憶馮對語言的苛求。他選定了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文學探索過程中的必經之路，沉迷其中，自得其樂。重寫的革命，既讓薛憶馮重新拜訪昨日之我，也令他創造與別不同的明日之我。



在通往麥加的路上，薛憶馮用「金子般的文字」，書寫着屬於他的精神自傳。



《出租車司機》（「深圳人」系列小說集）薛憶馮著



傾聽的薛憶馮是紳士的，他注意接收每一個信息並反饋回來，就像一塊海綿，不放過任何一個水滴，保持着作家的敏感。



《文學的祖國》薛憶馮著



口語的薛憶馮是家常的，沒有口音的語調溫和，語速略快；和他的文字一樣，濃度極高，邏輯縝密，敘述過程追求完美。

對話 薛憶馮

記者：你的經歷比較豐富，工作、讀書、寫作，每隔幾年總有一次「遷徙」。能簡單介紹下嗎？

薛：我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出生於湖南郴州，四個月後遷回長沙，在那裡完整地經歷了「十年浩劫」。最早受的是工科教育，本科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。後來我相繼在湖南的研究所、大型國企、政府機關以及深圳的民營公司工作，每一段工作的時間都不太長。再後來，我去廣州求學。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之後，回到深圳，在大學裡任教六年。然後，我來到了加拿大，並且再一次回到校園，直到獲得我的英美文學碩士學位。一位研究者稱我的生活是不斷地「逃離」。從上面的經歷看的確是這樣。

記者：你創作的其他小說也在反覆思考生死、時間的問題。是什麼影響了你的創作方向？

薛：彷彿與生俱來，從小我對文字敏感，對死亡敬畏。另外，它也與我們這一代人的特殊經歷有關。在我們的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，改革開放一聲炮響，給我們送來了「存在主義」。我16歲那年就訂閱了《哲學譯叢》等學術雜誌。我至今保存着自己那時候讀過的薩特的著名論文《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》，當時在頁面空白處留下的大量批註標明了我隨後的方向。對生與死的思考讓「個人」的命運，尤其是「個人」與歷史的衝突成為我的寫作的起點和重點。

記者：你24歲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說《遺棄》。中國的哲學家比文學家們更看重《遺棄》這部文學作品的價值。這部作品從創作、出版本身的經歷也很有戲劇性。

薛：是的。我的作品離現實是很近的，我更願意認為它靠近美學。讀了《遺棄》的人評價很高，可是這本書在它出版後的8年裡近乎銷聲匿跡，不會超過17個讀者。

1997年深圳書展，經作家周國平介紹，何懷宏讀了這本書而大加推崇。在1997年最後一期的《南方周末》，他推薦了三本書，其中就包括我的作品《遺棄》。《遺棄》很快引起了關注。艾曉明甚至說，如果不關注這部小說，我們對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生活的了解，將是極不清晰的。

記者：24年後，你重寫了《遺棄》。為什麼要重寫？

薛：是不同語言的衝撞導致了我對漢語的嶄新感覺。在2007年前後，這種嶄新感覺讓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舊作（包括那些被評價很高的作品）中語言和敘述上的破綻。我無法容忍那些破綻，於是從2010年開始嘗試重寫。沒有想到，這個過程持續了整整三年。這是一個充滿痛苦又充滿驚喜的過程。我的重寫尊重原來的故事和情緒、結構。它針對的語言和細節，與舊作相比，重寫版語言流暢、細節豐富。它們都贏得了閱讀的肯定。

記者：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加拿大作家艾麗絲·門羅文筆簡練精準。你的文字也有同樣鮮明的特點。你很在意文字的精準。

薛：簡練精準是寫作的最高境界。這種境界更像是一個奇蹟，會讓當事人和旁觀者都有「成事在天」的感嘆。能夠一直生活在這種理想的狀態中，靠的是對文學的狂熱和虔誠，或者說對文學的「愚忠」。

記者：回國後，對於自己作品中的中國和現實的中國有什麼不同的感覺？

薛：我作品中的中國是我記憶中的中國，我關注的現實是歷史中的現實。我只會寫經過我的心智時間咀嚼，並且已經徹底消化了的素材。回國的感受總是極為矛盾，一方面我看到祖國的活力，這讓我興奮；另一方面，我看到人們的浮躁，這讓我沮喪。總有一天，我們記憶中的家園會變成一個面目全非的地方。這令我絕望。我懷念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長沙，八十年代的北京，九十年代的深圳……它們現在都只是記憶中的幻影。